

論析現代戰爭中國軍野戰戰略學科的 「典範轉移」

The Study of “Paradigm shift” On the Armed Forces' Military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in Modern Warfare

胡敏遠 上校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軍聯組教官

提 要

- 一、學術界引用「典範」的概念，主要來自孔恩的典範學說。典範是一個示範性的科學成就，在此學科中其他問題的解答都可以根據這一個成就作為模型，用類比方法來得到解決。
- 二、從「典範」概念檢視野略思想，其具有一系列的符號通式、共享價值、共同信念及範例。實際上它具有一系列的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於其中，故野略已具備「典範」的各項條件。
- 三、促使野略傳統典範轉移的因素包括：高科技武器及資訊、人道主義、政治力量的干預、人價值觀的改變等多項因素。
- 四、野略「典範轉移」的實踐，必須重新凝聚兵學研究社群，強化與外界學術的交流，並與社會科學接軌，同時結合可能遭遇的外部威脅因素，才能使野略的「典範轉移」順利達成。

關鍵詞：野戰戰略、典範轉移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radigm shift” referred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as from Thomas Kuhn's Paradigm Theory. Paradigm is a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n demonstration. Within this science, the answers to all issues could be solved by drawing an analogy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l of achievement. The concept of “Paradigm” is used to examine the ideology of Armed Forces'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by employing a series of symbolic logic, shared value, common belief and patterns. In fact, within itself, it is a complete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s a resul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actually owns the criteria of “Paradigm.” In this study the factors of the traditional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Paradigm shift” includes: high-tech weapon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humanity, political intervention, changes of human perspectives, and so forth.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Paradigm shift” needs to recruit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f military science,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with civilian academic world, communicate with social sc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 the possible factors from external threat, so that the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Paradigm shift” could be achieved successfully.

Keywords: Field campaign strategy, Paradigm shift

壹、前言

國軍軍事戰略中的「野戰戰略」(以下簡稱野略)思想,所表達的意涵是大軍用兵思想的靈魂;^{註一}它是以戰場上軍隊的指揮與運用作為運用與操作的互動元素;它同時能創造與運用有利態勢的作戰指導,以做為支持軍事戰略及國家戰略的重要支柱。尤為顯著者,野略的功能是為了在戰爭的實踐場域中,遂行軍隊指揮與協調的能力,它甚至已演化為可操作性的行動準據。

不可否認,長時期以來兵學界諸多先進投入對野略的研究,對野略的思想、理論及實踐準則提供了豐沛能量,野略學早可形成軍事科學的學科「典範」。然而,由於國軍軍事科學在學術界尚未能形成一門學科(軍事學),野略用兵思想自然無法在社會科學中立足成為一門研究的「典範」。尤其,野略用兵思想及操作方式隨著時間移轉、政治環境、人道價值觀與科技武器的演進,迫使該學科已面臨一個急須轉變(典範轉移)的時刻。

事實上,野略的「學科典範」是一個不斷地在理論——實踐——新理論——新實踐…的過程中成長,是一個持續循環的辯證發展過程。但是,一個傳統兵學學科尚未被認定為「典範」的氛圍下,另一個新的典範又不斷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進而極欲尋求突破目前典範的情況下。實有必要將現有的野略

思想、理論與現實挑戰因素進行的辯證結合,並仔細揣摩未來戰爭發展趨勢,以期為野略的「傳統典範」及可能產生的「典範轉移」,做一說明,此乃研究本文的重要旨趣。

貳、野略「傳統典範」概述

一、典範概念的哲學分析

典範的概念是由希臘文(paradigm)翻譯而來,其意涵為範例、模型之意。目前學術界引用「典範」的概念,主要來自孔恩(Thomas Kuhn)其所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對典範概念的界定。^{註二}孔恩分析出一個科學傳統的生命過程大致可分為常態科學、危機期間與革命階段三個部分。所謂的典範通常出現在常態科學期間,典範轉移則會出現在危機或革命階段。孔恩認為:「一個典範就是一個示範性的科學成就,其他問題的解答都可以根據這一個成就作為模型,用類比方法來得到解決。」^{註三}事實上,孔恩的典範概念認為任何一門科學史的發展其實不是一個經驗的累積的過程,而是一個科學常規和科學革命的交替過程。他認為典範科學發展的歷程,概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前典範時期:屬於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多學者(孔恩稱為科學社群^{註四})可以依據自己的見解不斷創造與發表個人見解;

^{註五}

^{註一} 野戰戰略為國軍大軍用兵的戰略思想,而所謂「大軍用兵」就其字義言為一個操作性的概念;是指運用一支「大部隊」的作戰概念。因此,「野戰戰略」即為一套兵學思想與用兵的方法。故本文所指的「大軍用兵」究其知識論與方法論而言,實際上即是「野戰戰略」之意。

^{註二}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3年3月),第2章。

^{註三} 同註二,頁54。

^{註四} 孔恩所謂的社群是指以某一學科的研究人員,共同享用同一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方法論。這群在同一學科領域範圍的人員,孔恩稱之為科學社群。

^{註五}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第2章。

第二、典範樹立時期：科學社群已逐漸發展出一套可用它來解謎和推廣的科學規則，以解決可能遭遇到的難題。科學社群會運用大家都已認定的方法、原則與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註六}

第三，危機時期：此時期共有典範出現了相互矛盾的解釋，或是共認的方法、原則及概念出現了不合時宜的現象。^{註七}此一時期會如同前典範時期一樣，科學社群的想法與意見也處於分歧狀態；科學家們的目的是想突破原先認定的方法、原則及架構中所出現相互矛盾的現象；

第四，典範轉移時期：在科學社群中出現新的理論，並不斷攻擊舊典範的哲學基礎架構下，一個新型態的理論將取代舊理論，而成為新的典範。典範轉移往往是從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典範，轉移到一個新典範，絕非一個累積性的過程，反之它是一個在新基礎（知識的基礎架構）上重新創建新的領域。^{註八}

孔恩認為科學社群接受一個典範之後，它也同時接受了一個標準，並以此來選擇研究的問題，那就是：在典範的保證下，科學家們必會有答案。大致而言，只有這種問題科學社群才會承認是科學的問題，並鼓勵它的成員來研究。其他的問題都會被科學社群所排斥，同時將其他問題視之為一種玄學。

^{註九}另外，孔恩非常重視「會意性的知識」^{註十}，他認為科學家應更加重視之，而非範

例性的知識。也就是說科學不能在規範的支配下發展，應同時具有範例外的發展。所以，一個科學社群應該按照三部曲的結構發展下去。

事實上，孔恩典範概念和學科的本質很難有實質性的界定。孔恩後來重新定義典範時，已將其改為「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這個概念。學科是指科學共同體所共有的；而基質是指由不同種類而具有條理的元素所組成。他認為「學科基質」(典範)應包括四個因素：第一，符號通式(symbolic generalizations)，通過這些符號通式，科學共同體（科學社群）可以進行溝通，以使科學家們能在學科中解決難題；第二，共同信念：指科學社群會共同遵守的承諾(shared commitment)，承諾泛指形上典範之意；第三，共同價值，是科學社群所共享的價值觀；第四，範例，即解答的例子。^{註十一}總之，一個「典範」的形成應包括該學科應具備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符號通式和範例等。它既包括成文的規範，也包括了會意性的知識。

二、野略的「傳統典範」概述

從孔恩的「典範」概念檢視國軍的野略用兵理論，可以了解國軍的兵學思想（野略）早已是一體門傳統的兵學典範（本文暫且稱之為「野略傳統典範」）。眾所皆知，國軍兵學理論與用兵方法一直延續著我國數千年以

^{註六}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頁60。

^{註七}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頁119。

^{註八}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頁137。

^{註九}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頁83。

^{註十} 孔恩所界定的「會意性的知識」，是指科學研究都具有散發性的特徵，科學社群為了吸收科學的新發現和新理論，必須拋棄他們以前所信賴的智力工具和新典範，必須重新評估舊典範，科學的發現都是必須具有革命性的。所以科學家必須解放思想，使其思想活躍起來，也正是「會意性的知識」所該具有的條件。詳閱，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臺北：心理出版社，2007年3月），頁169-170。

^{註十一} 王巍，《相對主義：從典範、語言和理性的觀點》（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4月），頁37。

來，以孫子兵法為主軸的兵學論述，這些學說早已實踐於各朝各代戰場及兵家的用（論）兵之道，而《武經七書》正是我國兵學典範的最佳寶典。

國軍自遷臺以後，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將軍奉先總統 蔣公之命開始著手研究大軍用兵之道，^{註五}余將軍籌組了國軍兵學界的精英，對東西兵學思想進行深層研究，嗣後於民國54年發展出「野戰軍戰略之研究」，隨即於當年開始在三軍大學戰爭學院講授，^{註六}爾後該課程發展完成後正式命名為「野戰戰略」。^{註七}余將軍所編纂的野略課程，其教材來源是藉由我國固有的兵學思想為載臺，參考了19世紀的戰爭歷史，及二次大戰期間盟軍在歐洲的作戰經驗，並運用余將軍在英、美國家所習得的知識體系，融會而成的精典之著。

野略兵學理論確立後，隨即在國軍各院校廣為討論及教學，歷經數十年來的推廣，野略理論的基礎及運用方式在兵學界已廣為論述，並已形成一套知識體系。此期間，野略思想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及模型早已確立，它同時也成為國軍用兵指導的最高原則。

若從孔恩建構「典範」的四個要素，再行檢視野略的知識體系，亦可證明野略早具備「兵學典範」的條件：

首先，野略具有一系列的符號通式(symbolic generalizations)，諸如速決作戰、持久作戰、攻勢作戰、守勢作戰、內線與外線作戰等用兵理論及原則，又如補給線在戰場上的操作要領，均為一系列用兵的符號通式（具備兵學的知識論及方法論）。

其次，就共享價值及共同信念而言；野略的哲學基礎屬於兵學哲學的研究起點，而兵學哲學是追求用兵理智的運用過程，也是指揮官發揮智力思維的根源。^{註八}野略的思維邏輯是屬於「兵學哲學」的範疇，而兵學哲學則是對戰爭本質的理解，進而追求戰略藝術的哲學，本質上即為一種運用哲學。而從軍事知識體系建構的角度來看，其實野略就是一種軍事方法論（或謂戰爭方法論）的建立與運用。^{註九}所謂方法論(methodology)指的是對某一研究領域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的原理原則所做的探討。^{註十}方法性的工具角色是指行動者能依據野略的理論，制定在戰場上實用的軍事行動原則及作戰方案。前者包括三軍聯合作戰與指導的一般原則，及各軍、兵種遂行戰爭的具體原則。後者，則包括戰略構想、戰役計畫及各聯參的行動方案與準據。所以，野略的知識在方法論上不僅是一套邏輯式的思考方式，他的適用性更可做為戰場上的用兵依據（方法與工具）。

最後，就野略的範例而言，它實際上具

^{註五} 余伯泉將軍於民國54年調任三軍大學校長時，即接奉先總統 蔣公手諭：「研究如何統一國軍軍事思想具報」，乃編組專案小組展開研究，此研究報告由余將軍親自指導撰寫於民國56年12月完成，並於國軍第十三屆軍事會議作專題報告，名為「統一軍事思想之研究」。參閱，國防部編，《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會史》（臺北：國防部，民國59年2月），頁30、33、48-50。

^{註六} 余伯泉，《兵學言論集》（臺北：三軍大學出版社，民國63年10月），頁1-14。

^{註七} 汪國禎，《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臺北：中華戰略學會出版社，民國91年12月），頁137。

^{註八} 趙雅博，《知識論》（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民國68年3月），頁455。

^{註九}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論》（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13。

^{註十} Iain Mclearn,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19.

有一系列的本體論、知識論及價值觀於該學科之中。因為，從知識的視野來看，野略是一種以戰爭經驗為主導的用兵知識體系。當然經驗在科學方法檢證下，容易出現不精確現象，此種知識若與有系統的科學知識相比，是否令人懷疑經驗性的用兵知識不夠科學？事實上，所謂經驗性的知識，是抽譯出具有共同性的通則，在將其化為概念，建立出條理化、系統化的原則。此種共同性的經驗性知識，可視之為「科學的經驗性」用兵知識。而兵學知識的積累則是由以往所發生過的戰爭經驗中，不斷地運用演譯與歸納而獲致。例如李德哈達(Liter Hard)在其精典之著《戰略論》提及：「歸納25個世紀以來的30次戰爭，又包括著280次以上的個別戰役。其中只有6次戰役是採取對敵軍主力做直接戰略路線的作戰方式而獲成功，其餘均是採取間接路線的方式」，所以他認為間接性的方式，在戰略上實在是一種最有希望和最經濟的方式。^{註六}李氏是從280次的戰役中，將作戰的經驗做了詳細分析與歸納，獲得「間接路線」的戰略概念，即為一種「經驗性的知識」。然而，「經驗性的知識」仍存有某些不完全「全真」的命題。誠如，李氏上述所言仍有6次戰役是靠直接戰略的路線，而獲成功。

由以上說明得知，野略的經驗性知識是不斷經由人類以過去戰爭來檢驗該學說的實用性與永恆性，以做為下一場戰爭中，戰場指揮官用兵的普遍原則。雖然，野略的理論根據雖來自戰爭中的經驗法則，卻會不斷的從戰爭中，對這些經驗法則實施檢驗。所

以，他可稱之為一種實證論的科學，而此種實證論的科學，卻必須融合戰場指揮官的智慧、感情與勇氣，才能使用兵的學理不斷昇華，此乃克勞塞維茲所謂的「軍事上的天才」^{註九}。換言之，經驗性的戰略知識是可解釋大多數的戰爭獲勝的原因，但並不能說他是用兵的「真理」。野略的用兵理論，歸納了戰爭的經驗而成為一種經驗性的用兵知識，但並不保證此種知識在未來的作戰中一定會獲得成功。惟此種累積性的「經驗性知識」卻可不斷激發新戰略思想的兵學知識基礎。

職是之故，野略的兵學知識體系實際上已具備學術界「典範」中所應有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符號通式等必備之條件。然而，野略用兵思想卻未能形成一門學科「典範」，主因是國軍的兵學研究隸屬在軍事科學的範疇下，而軍事科學尚未在社會科學的學術中站穩腳根，獲得一席之地前，野略的「典範」確立，仍有待繼續努力。

參、典範轉移的意涵

孔恩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不斷加強有關典範轉移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社會科學革命泛指科學的典範基礎已遭受到挑戰，意謂著科學家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改革，如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和產業革命。^{註十}孔恩的革命概念實際上已包括了過去和繼承之意。他同時提到，有關常態科學實際上是一個科學研究傳統，而所謂的傳統泛指一切從過去一直延傳到現今的東西，傳統同時是指人的行為特徵和人的行為和思想的產物，它是代代相傳的

^{註六} 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戰略論》（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78年），頁164-166。

^{註九} 成田賴武著，李浴日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臺北：黎明出版社，民國75年7月），頁32。

^{註十} 王巍，前揭書，頁39。

知識遺產。而這些科學的成就是某一科學社群的成員，在某一時期所公認最先進的研究基礎。^{註二}依照孔恩的看法若傳統的行為或思想仍然有效的存在於科學社群之間，原有的傳統典範仍可有效地做為科學社群解決問題的重要理論及依據。

孔恩的典範概念較強調知識體系如何自成一體的特性，同時強調知識應具備的「共時性」，相對的傳統知識則較強調世代相傳的特性，並強調其「歷時性」^{註三}。換言之，通常一個典範背後所支持的價值觀、世界觀、方法論、範例…等都會歷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會有所轉變，例如我國儒家傳統的文化典範，在歷經時代的挑戰下，此文化典範仍然可做為進行中國文化研究必須採用的重要典範依據。相對的，由於一個典範的價值觀、世界觀都受到強烈質疑或者其知識體系遭到另一個知識體系的衝擊或挑戰後，那麼原來的典範將面臨典範轉移的現象。可是當一個新典範出現後，原來的舊典範並不會完全消失，出現的是一個經過辯證的「揚棄」^{註三}發展過程後，重新展現其新「新典範」的風貌。例如國際關係的社會理論，即是經由另一個社會知識體系進入到國際關係領域後，對原有的新現實主義典範或是新自由主義典範進行批判與反思，進而發展出新

型的國際關係社會理論（新的典範出現）。簡言之，國際關係社會理論的出現並未將新現實及新自由主義的學說完全拋棄，而是出現包含前者但又更具說服力的新型學說典範。

因此，典範轉移並非是完全否定或顛覆所有過去既有的概念，反而會以重新吸納新的知識內涵後，再重新出發。

肆、促使野略傳統典範轉移的因素分析

一、高科技武器及資訊科技的精進對野略用兵的影響

現代戰爭（或未來戰爭）與傳統戰爭型態的最大差別，主要在於尖端科技武器大量運用在戰場上。其次是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相互參雜在戰場上，甚至非正規作戰在戰場上大量的使用。^{註四}另外，有關戰場的透明程度也因資訊裝備的大量使用，使戰場將更加透明化。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使戰爭中的參與者從純粹的野戰部隊擴增到政府機關、工業界、學術界以及整個國防資源與資訊系統都已整合到作戰的夥伴（戰爭的主體內）架構內。^{註五}因此，在高科技資訊作戰的現代戰爭中，對野戰戰略思想影響最大者莫過於武力戰主體（參與者）的改變，它是從過去純粹陸、海、空為主體的武裝隊，擴

註二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頁53。

註三 所謂「共時性」是指一項知識在不同年代仍保有其有效性，例如「實證主義」的知識範例，歷經數百年，其知識領域並未被推翻，因此該知識具有「共時性」。反之「歷時性」則指知識的有效性受到時間的限制，僅能侷限在某一個朝代，例如資訊科技在19世紀以前並不存在，此一知識僅能具有「歷時性」。

註三 依據黑格爾的辯證學說，揚棄的發展階段包括三個層面：第一，保存階段(preserve)；第二，否定階段(deny)；第三，提升階段(promote)。所以「揚棄」在辯證法中乃否定本身所包含原有的內容，但又須藉由本身之內容進行下一階段的轉變，以蛻變出另一個新的階段。See, Joachim. Israel, The Language of Dialect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Language (London: Harvester Press), p.345.

註四 岳嵐、陳志波、古懷濤編，《『打得贏』的哲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9月），頁70。

註五 里·阿米斯德(Leigh Armistead)編，國防部譯，《資訊作戰以柔克剛的戰爭》（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年8月），頁37。

大為以科技為主導的多個主體的全民國防作戰的概念。多重主體的出現代表著，兵學的本體論將從過去以野戰軍為主的兵學論述，轉變為多重主體相互互動、相互依賴的兵學理論。

尤其，武器科技及精密資訊裝備不斷廣泛地運用到作戰場域的各個層面，對戰場的複雜程度與用兵思想與方法造成巨大衝擊。例如，用兵方法往往蘊藏在科學發展之中，新的戰爭型態及用兵思維也與人類科技武器的創新而生生不息。^{註五}而對於高科技武器及資訊作戰的成功要領必須仰賴各個參與者的相互合作，這代表著用兵概念必須展開水平及垂直的合作關係，此種整合不僅僅限於武裝部隊，也包括了非政府組織與私人產業的參與。^{註六}

最後，當新型武器在戰場上造成巨大傷亡之際，必然會產生對「人」或「生命價值」的重視，隨之產生變化的則是，戰爭遂行的必要性，或戰爭的目的是否仍須以完全摧毀敵人的有生力量為最終的目標；其次，由於精密武器的成本非常昂貴且不易獲得，實踐上都直接影響國家整體經濟戰略的運轉，因此戰爭指導者思考戰爭的執行面時，已將「避戰」列為用兵思想的最高指導原則。

總之，高科技武器及精密資訊的因素衝擊下，野略的價值觀、方法論及作戰的理論及模型都受到根本性的挑戰，也迫使野略的傳統典範面臨必須移轉的危機感。

二、價值觀的轉變——人道因素的影響

時勢推移，歷史遞嬗。任何時代的社會價值觀往往決定一個時期政治、經濟、軍

事、人文等方面的主導力量。綜觀人類文明發展至21世紀的今天，無論是國內或國際「政治」發展的最高目標就是追求「人道」。反之，背離「人道」的政治手段，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皆是悖天逆人的反動思維。事實上，國際間對於人道的關懷及和平的維持，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即已在國際間推展，其中關鍵角色主在《聯合國憲章》已將人道議題列為維持全球和平的重要工作。因此，自1950年以來全球發生的戰爭、武裝衝突及天災人禍等不幸事件，都會發現來自國際間各國打著「人道關懷」的聲音，控制整個衝突事件的擴大。

事實上，美軍的軍事行動準則中早已將人道救援及維持和平的軍事行動列為其作戰行動綱領之中。而國軍在臺數十年的演訓備戰中，每當國家遭遇重大災難之際，國軍都是主要的參與者。因此，未來人道援助的價值觀，方法論及參與模式，必將對我國野略用兵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改變。

三、政治因素——國內與國際干預力量

傳統野略的典範受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影響很大，克氏認為戰爭目的是為實現戰爭的本質；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註六}因而無論攻擊或防守雙方都是以殲滅對方為主要手段，在方式上是儘量集中優勢戰力藉著機動力及戰力之分合，迫使敵軍於不利狀況下決戰，殲滅敵軍。^{註六}克勞塞維茲的信徒魯登道夫在其《總體戰》中指出：「要對敵方整個民族實施打擊，軍人、平民、軍營、軍事經濟目標、交通等都是攻擊目標，因為既然一切都與戰爭

註五 沈偉光著，《新戰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頁119。

註六 里·阿米斯德(Leigh Armistead)編，前揭書，頁65。

註六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民國80年9月），頁2-4。

註六 克勞塞維茲，前揭書，頁722-733。

有關，那麼破壞的任何部分都是合理的。」
註手不可諱言，受克勞塞維茲的影響下，自19世紀以來的戰爭，其戰爭目的設定都無法脫離「澈底擊滅敵軍」的思考。此種以「力」為核心的思維，深深地根植於傳統野略兵學典範中。

事實上，克氏對上述「絕對戰爭」的概念早就認定不可能實踐於未來戰爭中。因為，戰爭的遂行必須受政治影響且必須服從於政治的指導。克氏甚至於將「絕對戰爭」與「有限戰爭」進行區隔，他的至理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都在說明未來的戰爭領域必須接受政治力量的干預及指導。從二戰以來的戰爭經驗更可以看出，每一場戰爭的發動、遂行甚至終戰決定及指導都是政治決定。

四、人的價值觀對野略知識體系的影响

「人」是組織野戰戰力的基本原素，亦為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野略的價值觀、世界觀及知識論都從「人」做為知識的起點，進而發展出各種模型與理論架構。然而，二戰前無論東西方的戰略思想家卻顯少顧慮到「人」的價值觀，只重視將帥的指揮道德及能力，而將所有的「人」都視為達成戰爭目的的主要工具。例如，二戰期間英國與法國的戰爭準則主張須以強大步兵（人力）為主幹的軍隊，以做為防禦戰略的重要主幹。又如國共內戰期間，共軍對付國軍的最有利戰法為「人海戰術」，共軍視武裝部隊的士兵或者當地百姓，都將其看做是剋服敵人的重要籌碼。不可否認，二戰以前的兵學價值觀確實未將人的價值融入到戰略思想當中。

然而，二戰以後尤其是美軍在越南的戰爭，可看出世界各國的用兵概念，已愈來愈

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觀。例如美軍在越戰後，為了尋找美軍在越南失蹤的官兵或陣亡官兵遺體，不惜動用大筆的人、物力與越南政府交涉，以期尊重陣亡官兵生命的價值觀。上述作為象徵著「人」的價值觀在未來戰略思想中應列為重要的思考要項。

是以，過去戰爭思想的鐵律——「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屈服敵人最有效的手段，可能因「人」生命價值觀的重視而有所改變。又如美軍兩次在伊拉克動武，美軍的攻擊目標都避免攻擊伊國百姓，甚至對於軍事目標的選擇，也避免直接殲毀滅伊軍的野戰部隊。反之，是以伊軍的軍事設備、指管通情系統等硬體設施做為主要攻擊目標。由此可見，戰場上的目標選擇以及對「人」價值的重視，將是未來野略典範轉移時所必須慎重思考的重要因素之一。

伍、野略「傳統典範」向「新典範」的移轉

一、傳統典範的辯證發展

野略「傳統典範」的形成，代表著我國兵學體系歷經數百年的戰爭經驗的結晶；此一典範包括了以我國《武經七書》為主體的兵學體系，以及融合西方自拿破崙戰爭以來的兵學理論；此一典範無論在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上都有其一套完整的理論與模型，以供兵學家的運用與推廣。

事實上，傳統兵學典範之所以歷經數百年而不衰，主因二戰以前的戰爭型態，受資訊武器科技、國際勢力、人道因素等外在干預力量較小。另外，傳統的兵學研究社群中，無論是領導軍隊的指揮者，抑或是在軍事院校傳道的兵學家，科學家們的相似性都

註手 劉慶，《西方軍事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226-236。

極高，即使存有差異性也都在同一個知識論的架構中相互爭論，大多跳離不出既有的典範中。此種類型如同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稱謂的「機械連帶」^{註三}關係。換言之，野略的兵學理論如同一部剛性憲法，研究社群的成員都必須在共同的知識體系中，遵守共同原則、共同想法及共享價值觀及共同之模型。

相對的當上述外在影響力不斷進入到武裝部隊內，兵學研究領域必須重新面對新的是多重主體及多項外在因素的挑戰時，此一衝擊後所演變出的新理論或新的知識論，即稱之為「典範的移轉」。此時期的兵學理論受到各個主體專業化的連帶關係，各個主體都有參與其中的必要性，因而各個行動體都以展現本身的自由行動意志為主要目標。此種彼此間的連帶關係，同樣可以涂爾幹的「有機連帶」^{註三}關係來加以解釋。換言之，「有機連帶」關係必須依靠各個參與者的相互依賴、相互協商，才能將用兵的效益提升至最高境界。

二、「典範轉移」的學術論證

孔恩的科學發展是從他的某種既定質態開始，他借用典範概念說明科學的發展是從一個典範開始，卻以另一個新的典範代替舊的典範而告終。典範的穩定存在於常規的科學期間，常規科學必須歷經一段時期的發展後，舊典範必然會向危機階段發展。伴隨危機的到來，大量的批評及挑戰會直接衝擊到原有的典範，此時即會出現典範轉移的現象。而典範轉移涉及到的關鍵議題，在於原

有典範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方法論是否須完全改變。

誠如學者拉卡多(Lakatos)針對孔恩的典範觀點提出其對「典範轉移」的不同論述。他認為孔恩的社會科學革命是以典範的轉變做為科學革命的分水嶺。然而，一個典範的形成有其歷史觀與世界觀夾雜其間，若把典範講成像是一個「理論體系」。因此，典範轉移會成為一成不變的規則，否則即會產生科學革命，此種演變自然會出現一種相對主義的二元論（常規科學／非常規科學）。然而，近代科學革命不是一蹴而成，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其次，典範轉移是在革命中出現，它同時也會有繼承的因素伴隨其中，它是一個逐漸發展過程；是在革命中有否定也有繼承的辯證向上發展。

基於此，拉卡多發明了「硬核說」及「保護帶」的學說，以闡釋孔恩的典範學說。他認為典範乃學科的核心理論，例如牛頓的向心力學，為牛頓力學的核心理論。核心構成了典範的本質，除非硬核改變典範才會產生移轉。某一個典範的人不能學習另一個典範，所以典範轉移只能是革命而沒有繼承。「保護帶」是指為避免硬核遭受攻擊而提出輔助性的假設帶，當一個研究綱領的硬核遭到挑戰進而改變了硬核，才會造成典範的移轉。如果硬核不變，僅是在保護帶地區做一些修補工作，代表著典範並未改變。因此，典範的基礎和基本原則被觸動了，即會發生社會科學的革命。

三、野略的典範轉移的可能性

^{註三}「機械連帶」是指由相似性形成的連帶關係。因為每個人進入到一個社群中，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屬於某個社群中，社群中的「集體意識」會成為群體成員的共同感情和共同的信仰。這一時期的成員彼此相似，擁有同樣的感情，贊同同樣的道德標準，承認同樣的神聖事物。詳閱石計生，《社會學理論》（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1月），頁64-65。

^{註三}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譯者導言部分，頁27。

事實上，孔恩的常態科學與科學社群結構的許多想法，其實間接地強調學術自主性的原則。他強調一個學科的長足發展，往往必須建立在它與外界事務的隔離與封閉之上。除非在革命時期，一個比較不能自主、自立的科學社群無論它是理論性還是技術性的，從社會學觀點來看都是無法真正有所發展。^{註三}

目前，傳統野略的學科典範仍為國軍兵學思想的主要內容，各軍事院校也仍以他做為教材，惟該學科的理論架構與學科基質對於諸多現代戰爭中出現的異常現象，已無法進行全面的解釋，例如1991年美國在伊拉克遂行的戰爭，對於聯軍戰略目標的選擇，與傳統野略的理論典範即有所出入。類似此等現象層出不窮。換言之，野略目前所面臨的是一個從常態科學時期向非常態科學時期轉變的階段。所以，目前野略的知識體系實須回到該學科的基礎部分（本體論），重新加以檢討，才能真正符合社會科學的基本要求。

事實上，野略的兵學研究實際上於最初階段（創立時期）即應與社會科學（科學社群）接軌，爾後即可在兵學的價值觀及知識論的架構下，發展出屬於自主自立的兵學科學社群。然而，過去因未形塑出自己的傳統典範下，目前一個既存的典範又得接受來自外來各種因素的挑戰下，現有的野略知識體系仍然必須面臨危機時期的來臨。因此，野略傳統典範即必須面對典範轉移的洗禮。

陸、野略學科未來發展的走向分析 （野略典範轉移的方向）

一、兵學研究社群的凝聚

長期以來，野略研究人員大多限於軍中熱愛兵學思想的喜好者，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也多未與外部學界有所牽連，致使兵學的研究社群無法形成，遑論上述的研究成果能形成一家之言。因此，本文所指的「兵學研究社群」的概念，當然須引用孔恩常態科學時期的研究社群的概念；研究社群泛指一群熱愛軍事研究的學術界學者、長期熱衷於兵學研究的軍界讀者或正從事於軍隊指揮的軍事人員等。

兵學研究社群人員必須拋開過去在象牙塔裏閉門造車的封閉觀念，反而應廣為吸納學術界的知識領域，將野略的「傳統典範」與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典範進行交流，才能使「傳統典範」成為真正的學科典範。

二、掌握影響野略兵學典範的變動因素

高科技武器快速發展、人道干預、政治力干預及人價值的改變是目前野略傳統典範面臨外部與內部挑戰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對於若干用兵法則、模型及理論已形成嚴峻挑戰。各國武裝部隊準則已針對實際作戰需求提出若干的修正或增加運用方式。例如俄羅斯軍事參謀學院即撰寫了一本資訊戰概論，他們對於資訊戰的戰爭目標界定為「資訊鬥爭是一種特別的戰爭種類，它不但是一種個別獨立的戰爭形式，亦是任何其他作戰型態的一部分，並且這種戰爭是不分平時與戰時。」^{註四}類似俄羅斯對準則的修訂，研究社群也可預測政治因素對未來作戰之手段、方法與特徵，以及其規模與期程，同時亦包含必要之物資與財力等支援因素，都將對野略用兵思想與方法造成巨大影響。

^{註三} 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前揭書，譯者導言部分，頁24。

^{註四} 里·阿密斯德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前揭書，頁244。

任何學科的典範形成，必須具有該學科構成概念的基礎，其中包括了類別、法律、模式與原則。類別與模型反映的是某一時期作戰的性質與型態，並代表了一套作戰的術語與用兵方式。所以，一個典範的外在威脅因素可以反映出該典範可能在知識結構與模式上所面臨的問題。因此，要掌握外在因素就須掌握該學說的各項變化因素，運用辯證法則的規律才能與時俱進，此一規則為：首先，須先了解「常態」(正)；同時思考「非常態」(反)；才能在典範轉移時，創造一個新的、合宜的新型典範(合)。上述的法則又取決於經濟、國際政治、人道、科技與軍事能力等因素。

三、發揮以「人」為自主自立的兵學知識體系

事實上，兵學的研究中「人」的成分佔據很大的分量。因為兵學知識的實踐仍依靠人在戰場的實踐，才能使兵學理論獲致肯定。人的潛能是依靠人本身具有的「主觀能動性」才能達成。主觀能動性更是人類所特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由於人(操縱戰場的指揮官)在用兵的實踐過程中，必須能動地認識戰場環境的特點和規律，並根據這種認識的能動性，實施作戰指導。不可否認，戰爭是一種非常激烈的對抗性爭鬥活動，軍事指揮官的自覺能動性必須充分發揮，才能將人的「思維」與野略的「知識」結合為一。此種「合一」的過程是通過人對戰爭與戰場環境的感性認知，進一步到達理性的認知過程。換言之，人是主宰戰場環境的靈魂(主體)，戰爭中的發展過程則為一個流動性的客體，在主客兩體的辯證與發展下，野略的知識則成為兩者的黏合劑，並成為指揮軍隊與指導戰場的主要憑藉。

依據上述說明得知，野略用兵理論處於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他與常態科學最大之

不同在於其外在威脅始終存在。因此，人在處理變化萬端的外部環境威脅時，若將野略的典範視為一層不變的鐵律，則野略的原理原則將持續受到批評，甚至遭到揚棄的結果。野略的本質是起源於人類在鬥爭活動中的謀略活動。原始的謀略思想是如何在爭鬥中鬥智的思考行為，人類爭鬥中所用的鬥爭工具——武力(軍事權力)，會隨時代與科技的進步不斷精進。易言之，野略的本質是屬於流變狀態的性質，他會隨時代與科技的改變，在模式與典範的形成會不斷的進行變化。

準此，人(主體)在創造與運用野略知識時，必須將野略視為一種觀念，也是一種思想。如同前述，他會隨著人類文明、人的價值觀及科技的進步，其內涵與運用方式也會不斷地變化和擴大。簡言之，野略思想的發展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演進過程。而在「變」與「不變」的辯證之中，野略的知識體系(包括世界觀及方法論)成為兩者的橋樑。

柒、結 語

野略在我國兵學的發展史上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歷經數十年來的成長，該學科實際上具備獨立與自主的價值觀、方法論及模型，尤其是兵學理論、用兵模式及使用方法早已成為國軍建軍備戰的準繩。然而，它長期以來均未能與外界學術單位交流，因而野略傳統理論未能形塑出一個重要的兵學典範。尤為甚者，野略目前又面臨時代遞嬗，各種外在的干預力量不斷衝擊野略傳統典範的知識體系。若依孔恩的典範觀念，野略目前所面臨的是由一個由常態科學時期向非常態科學的時期轉移，亦所謂野略「典範轉移」的時代。

典範轉移本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階段，在變的階段中必須依靠科學社群的推波

助瀾，才能將典範向另一個新典範的方向移動，否則原先的典範將逐漸凋零。職是之故，野略的科學社群必須重新凝聚，同時也須強化與外界學術的交流，使野略的知識體系與社會科學接軌，以增強野略傳統典範的生命力，進而讓該典範結合可能遭遇的各項外部威脅因素，才可能使野略的「典範轉移」順利達成，以達成與時俱進之時代使命。

收件：98年08月26日

修正：98年10月16日

接受：98年11月16日

作者簡介

胡敏遠上校，陸軍官校72年班、巴拉圭三軍指參學院1993年班、陸院85年班、戰院87年班、戰研所92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法學碩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戰略研究、社會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軍聯組教官。

